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 发展的道路



陕西人民出版社

学术指导： 费孝通
主 编： 何金铭 周尔璠
副主编： 张继稻 郑欣淼
 吴崇信 王景文
编 委： 李兴平 徐永凯
 李 杰 张良铭
 宋昌斌 祝春荣
 武会儒 杨庆福
 马雨桑
责任编辑： 魏 晋

目 录

- 四年思路回顾……………费孝通 (1)
- 城乡协调发展的几个问题……………李玲生 (44)
- 我国城乡关系的历史考察……………张雨林 (54)
- 城乡经济关系：在协调中走向一体
……………郑欣淼 侯辅相 王同信 吴长龄 (80)
- 建立城乡协调发展机制
——对宝鸡市推行城乡一体化新情况、
新问题的研究……………王景文 黄龙 张良铭 (97)
- 论城乡协调发展机制……………居福田 (116)
- 城—镇—乡三元结构及其协调发展……………邹农俭 (131)
- 社会主义城乡联合的新格局……………范恭俭 (146)
- 陕西省农村城市化道路研究报告……………李笔戎 (162)
- 城乡协调发展规律及梯级模式
……………毋青松 王蕴娴 周德章 (194)
- 走出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目标迈进……………吴崇信 (202)
- 试论农村社会分化整合与发展
——对苏南农村社会发展的粗浅分析……………吴大声 (213)
- 关于京郊适度规模经营的社会动因探讨……………周岗 (227)
- “城乡隔离”及其终结
——兼论中国城市化的道路……………郝直 卢新生 (250)
- 农村社区教育与社区发展
——湖南省桃源县社会调查报告……………李 慷 (259)

- 陕西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若干问题
..... 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 (293)
- 建设小城镇, 发展大事业..... 张继韬 (323)
- 对湖南小城镇发展与城乡关系探讨
..... 卓康宁 贾福荣 胡向荣 (338)
- 江村近况..... 王淮冰 (351)
- 迅速建立西部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几点思考..... 向全福 (369)
- 西部资源开发中“企地结合”模式初探
——“安宁模式”与“鲁壑山模式”
的比较和思考..... 朱净宇 朱赤平 (377)
- 县级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中共新疆区党委研究室 (388)
- 疏附县两村经济社会情况调查..... 何炳济 (430)
- 对阿拉善盟经济发展的社会学思考..... 钱灵犀 (450)
- 后 记..... (465)

四年思路回顾

费 孝 通

1984年7、8月间，我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学术讲座”，对我过去的社会学调查作了一番回顾，一共10讲。后来以《社会调查自白》为书名出版，又收入《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这本文集里。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4年多了。1989年新春，我应日本友人鹤见和子教授之约写这《自白》的续篇，追述这4年来我在社会学研究中思路上的开拓，以参加中日两国学者合编的一本有关农村和小城镇研究的文集。

(一)

我早期社会调查的对象是中国农村。30年代我所调查的只是一个坐落在太湖边上约360户的小村子，我称它作“江村”。以这个小村子作窗口，我想去观察中国农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尽管当时的农村在社会生活上自给自足的程度很高，但是它决不是一个和四周脱离的封闭社区。它在各方面都和外界有联系，特别在经济上依靠着附近那个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流的集镇。我在江村调查时虽已明白这个情况，并已看

到城乡联系的重要性，但限于时间和条件，我的实地观察还只能自限于这个小小村子，没有跟踪寻源到集镇。直到80年代初我恢复了学术工作后才有机会走出农村，进入集镇，把我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

由于我是从农村出发去研究集镇的，因而我的着眼点一开始并没有限于集镇本身，而首先把它看作是城乡的结合部。从这个角度我提出“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十字研究课目。我还是主张采取实地观察，“解剖麻雀”，由点及面，从定性到定量的研究方法。这次调查不象50年代那样单枪匹马地一切都由个人操作，而组成了一个可以实行分工合作、集体讨论的研究队伍。我们先从江村所在地的吴江县的各集镇调查起。根据各集镇功能上的特点分出了五种不同类型，又从商品流通及行政系统上分出三层五级，然后注意到它们的分布和兴衰过程，最后探索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

8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各地小城镇开始复兴的时刻。我们注意到吴江县的这些集镇人口无不在急速增加。追究过去，了解到它们都曾在50年代进入过一个衰落时期，人口下降；70年代后期陷入谷底，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嗣后前前后后出现了生机。当我们去调查时，这些集镇的面貌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

各地方的集镇怎么会兴旺起来的呢？这个问题吸引我们注意到当时正在有如异军突起般发展着的乡镇企业。当时因为这些是公社和生产队所办的工业，所以一般都称作“社队工业”。集镇是社办工厂集中的地方。这时集镇上新办的工厂纷纷到农村去吸引农民出来当工人，集镇的人口也就多起来了。工业带

来了繁荣，集镇上新的建筑一座座盖了起来，面貌大变。农村里也由于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办了工厂，收入增加了，农民生活改善了。这种令人兴奋的景象，很自然地吸住了我们的研究兴趣。

这里也不应当忽略我私人的因素。我30年代调查江村的兴趣是被当时该村举办的生丝产销合作社引起来的。我在江村调查里得出了“人多地少，工农相辅”这个对当地农村经济结构的概括。从此也得出了发展农村工业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的观点。这种观点我又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的云南内地农村调查里得到支持。时隔30年，事实证明我早年的主张并没有错。我对此自然十分激动。这股出自内心的动力很容易把我推向这个研究课题。

回顾从1982年到1984年这3年，我的调查活动几乎全部放在江苏境内，从吴江一个县开始，扩大到包括吴江县在内的苏南4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接着从北向南，访问了苏北4市（徐州、连云港、盐城、淮阴）；再从南京沿江而下，访问了苏中3市（南京、镇江、扬州）。这样，对江苏这个沿海省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观。在这3年的调查里，我看到当时江苏各地的发展是快的，但也不是平衡的。而且可以看出经济水平由北而南逐步提高的趋向，并可以用各个地区总产值中的工农比例在数量上表示出来。北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工农比例是“工三农七”；逐步向南，经济水平逐步提高，工农比例也随着发生变化，工升农降。接近长江北岸，工农比例持平；过江偏东，已达到“工七农三”；靠近上海一些乡村，当时已出现“工九农一”的比例。综合这些情况来看，

发展乡村工业确是农村经济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这对我这三年的思路有深刻的影响，表现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小城镇四记》（《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苏北篇》、《小城镇新开拓》、《小城镇再探索》）里。

1984年我结束了对江苏的初步调查后，除了继续在江苏各地跟踪观察外，我的研究重点跳出了江苏。一路是沿海南下，经浙江、福建到两广；一路是进入边区，从东北过内蒙入甘肃、青海，并访问了新疆和宁夏。此外，还在沿海和边区之间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南和陕西了解一些情况。到1988年底的足足4年多里，我东西穿梭，南北奔走，使我的思路得以开拓和提高，真觉得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接触不同的人和事才能有所比较，有比较认识才能深入。我在这调查过程里，也不断把所见的情况和苏南比较，因而对“苏南模式”有了较深入的认识，突破了原来的一些观点。下面我将择要一述我的思路。

（二）

“苏南模式”这个词是我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的。那时我刚从苏北4市调查回来，感觉到苏南这个地区在农村经济发展上自成一格，可以称为一个“模式”。至于其特点是什么，和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等等，在我的认识上还不很明确，所以也没有具体地交代明白。

由于当时我对“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概念不明确，甚至还认为其他农村在今后会上苏南一样的路子，所以“模式”一

词包含了“模范”的意思,甚至带着“样板”的味道。这是不正确的。其实苏南农村由于其特有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和其他农村相同之处,又有其独具的特色。把它看成一种模式主要是在显示它的特点,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模式在概念上应当和样板区别清楚,不然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因为今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应当避免强制不同条件的农村仿效一个样板。“文革”期间的“学大寨”是一个不应当忘记的教训。1986年当我在温州看到了和苏南不同的另一种在农村里发展工业的路子时,就警觉到我所提出的“苏南模式”的概念不够明确,而且带有成为“样板”的危险性,所以着重提出“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主张。

我所说的“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苏南和温州是两个地区,具有相同和相异的历史条件,而在经济发展上走出了两条不同的路子。我们这些研究工作者有责任把这两条路子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作出具体分析。分析的结果可以突出各自的个性,称之为不同模式。下面可以简单地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来作说明。

这两个地方有相同的背景。自从50年代后期都实行了公社制度和“以粮为纲”的政策。这是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历史事实。这两个地方都是地处沿海,人口密集。人多地少是它们的共性。但是两地的历史条件却有区别。苏南历史上是个农村手工业发达的地方,以“工农相辅”来维持农民生活的。即在计划经济下还曾有过一段时期为了外贸的需要,维持了一定限度的传统家庭副业。温州则是个侨乡。这地方的农民一向到海外

去经营小商业，用侨汇补贴家用。解放后，国门封锁，外贸萎缩，逼得人口大量到全国各地去卖工卖艺度日。两地的传统因而相异。也同样在人口压力日益增长下，苏南农民抓住“文革”时期大中城市工业停顿、大量技工回乡的机遇，在原有“以工补农”的传统下，由公社和生产队办起了小型工业。农业体制改革中农村里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解放了出来，吸收进了社队工厂。这就是我在80年代初期看到的情形。温州没有办工业的传统，也不靠近工业城市，没有发展社队工业的条件。在“文革”期间大量外流的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起初是卖工卖艺偷偷地按他们经商的传统本领在地区间进行贩运。1984年改革的政策承认了长途贩运的合法化。这一大批流浪的人口摇身一变竟成了一支公开的流通大军，在国内开辟了大市场。就是这支流通大军回乡来分别开办家庭工厂，制造小商品以供应已开辟的市场，在短短的两年里在温州一市出现了有名的10大小商品市场。两个地方由贫致富是一致的，但是境遇不同，所走的路子也不同。结果两地的经济结构也各有特色。

先说苏南模式。苏南模式的初期是社队工业。社队工业产生在农业体制改革之前。当时这种社队工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呢？这些小型工厂实际上是公社或生产大队经济结构中的一部分，由公社的书记或生产大队长领导和管理。这种工厂里的工人是从本社或本队的社员家中招收的，记工分不拿工资。工厂的利润到年终结算。除了一部分作为公社或生产大队的财政和公益开支外，归入生产队的工分基金，平均分配给社员。这种工厂如果有利可图，上级政府还可以上调作为自己一级政府的企业。

当时牌子最硬的是国营企业，属全民所有制，有属中央各部管的，有属省、市管的。县办企业有的还够不上称地方国营，就称作“大集体”，于是就把公社或生产大队办的企业称作小集体。我当时也跟着把社队企业视作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新生事物的称呼难免含糊不清。事实上苏南的乡镇企业是公社制胎生的产物，它应当说是社队所有制，所以最初都叫它社队工业。

在苏南，公社体制改革后，农工分了手。农业经营承包到户，而社队办的企业却没有分，照原样办下去。公社名称改成了乡，生产大队改成了村，社队企业的名称也得改，一般称作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还是由乡长或村长领导和管理。一直到现在一些村办企业，还是由村长说了话才算数。在这个变动中，由于取消了工分制，工厂不能不给工人发工资了。但是一般工资还不是直接发给工人本人，而发给工人的家长。后来加发奖金时，在厂的工人才真正有现钱分到手上。我曾把这种改革中常见的情况比喻作蝌蚪变青蛙的过程，脱掉尾巴要有一个过程。到目前苏南乡镇企业里还可以看到公社制留下的尾巴：乡办企业利润归乡政府支配，村办企业的利润归村里支配；管理上还是乡长和村长掌权。实事求是地说，我想这种乡镇企业可以称作地方干部经营的社区所有制。社区是指一定地区里共同生活的人。社区所有制是指名义上所有权是属于这个乡或这个村全体居民的，而事实上由于利润由管理这个社区的行政机构所支配，所以性质和“地方国营”相类似，它跟国营企业不同只是一是全民所有，一是乡村居民所有。在当前阶段不论是全民所有或乡村居民所有，实际管理权都握在各级行政领导手上，政

企还没有分。

这一点说明白后，苏南模式就可以和温州模式在所有制上作出区别了。温州当然也有和苏南类似的乡镇企业，但是主要是家庭企业，就是所谓个体户，属个体所有制。严格说，如果个体的意思是指个人，温州街上的作坊也并不真是个人所有的，而是家庭所有的。家庭里有不少成员，而且通常并不限于直系亲属组成。许多是已婚的兄弟甚至亲戚合组成的家庭作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各人的责任和收入都有事实上的规定，有时甚至可以说是股份制的雏形。但是通常我们却说这是“个体所有制”或私有制。

当我在温州调查的时候，这些家庭作坊已出现“走向联合”的趋势。我用“联合”一词，是为了避免用那个可能会引起心有余悸的人反感的“合作”这个词。其实在外文里称“联合”不如称“合作”为确切。不同的个体企业联合起来按“合作社”的原则来经营，这是一种合作性质的集体所有制。这种合作组织常是以“亲戚”或街坊关系组成的作坊，也可以说是家庭所有制顺理成章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在概念上可以有严格的界限，这种界限在现实中是相当含糊的。家庭企业和各级政府所办的企业基本的不同是在一般所谓官民之别。

如果允许我在这一点上再作一些发挥，我想说在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公社和生产队一般都认为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事物。在历史过程中确是应当这样认定的。但是如果再一想，为什么公社这个制度能这样容易为中国农民所接受，而且运行了20多年？过去很少人

敢于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是值得加以思索的。在生产队的具体运作中，我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一大二公，何尝不是大家庭甚至推而广之到一个家族的指导思想？家长作主，统一指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又岂不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根本组织原则么？从这个角度看去，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社队企业是社队的副业。我并不想贬低新生事物，新的一面，只是想指出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且常常是脱胎于传统模式的。我指出这一点体会，很可能和鹤见和子教授的“内发型的发展论”有相通之处。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从乡土社会发展到工业化后的现代社会，这条道路上传统文化会起什么作用，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平心静气地加以分析和评估。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宜从概念到概念地作理论上的纠缠，而应当从活生生的一个个人的具体生活、思想和精神状态中去观察和体会，以求得深刻的理解。

(三)

沿海各省这10年里农村的发展，总的说来都是走兴办小型工业的路子，但各有各的办法。办法之所以不同都和各地特有的具体条件相关，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述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可是在最近三四年里，珠江三角洲又出现一种和上述两种模式不同的发展路子，不妨称之为珠江模式。这个模式对我的思路又起了有力的冲击和推动。

我到广州附近的东莞去访问是在1988年底。但是在和这个

发展模式接触之前，1985年我在访问香港时已有所感觉。我在访问回来所写的《港行漫笔》中有这样一段话：“从观塘的蜂窝厂家出来后，我突然产生一个奇特的念头：如果我有孙悟空的本领，真想一口气把这密密麻麻挤在多层大厦里的那许多工厂，吹散到内地广大的农村去。那么，这些蜂窝厂家不就成了无数的乡镇企业了么？我们除了无需建筑多层工业大厦之外，香港的小型工业在经营上确实是我们乡镇企业的一个范本。这范本里写着乡镇企业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文章。”①

香港原来是个国际港口，在过去20年里利用大陆上移入的劳动力和世界各地的原材料和市场发展了多种多样劳动密集型的小型工业。这些小型工业在我去访问时已有4.7万家，一家工厂是一个核算单位，职工达85.5万人，平均一家只有20人。这些工厂都挤在多层大厦里，一层楼里可以有好几家小工厂。一个老板可以有好几家以至几十家工厂，所以我称之为“蜂窝厂家”。当时就想大陆上的乡镇企业如果能象香港这样办，原料、市场两头在外，农村里的劳动力加上先进技术和管理，不是可以又跨上一层台阶了么？

我当时只想摇身一变，变成个孙悟空，把香港工业大厦里的蜂窝厂家一口气吹到大陆上去。没有定下神来再思考一下，怎样吹起这阵风来。时过3年到东莞一看，我那时的奇特之感却已成了事实。是哪一阵风把这些小工厂从香港吹来的呢？并不是真的出了个孙悟空，而是香港和大陆两地工资和地价的差额所构成的那一个气流，当隔着两地的政治屏风一撤走，不可避免地刮起了这阵经济风，在短短的两年里，珠江三角洲大大

① 费孝通：《外访杂写》第194页。

变了样。香港工业正在扩散。

我去访问东莞是应一位亲戚之邀去参加他办的成衣工厂的开张典礼。这个厂就设在东莞专为外资办厂的工业区里，从签约到开工只有半年。这位亲戚原来就在香港观塘办有一个成衣工厂，我访问香港时曾去参观过，也就是我发生奇特念头的地方。事情是够巧的，也因之对我思路的启发特别强烈。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当天，我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报道，说是香港有一家工厂的职工静坐在厂房里不让老板把机器运走。至于这个老板为什么要搬走机器，把机器搬到哪里去，报道里没有说明，只说是这个工厂的职工怕失业，反对把机器搬走。我那位亲戚在香港的工厂并没有关闭，但他和我说香港的工人的工资一个月要3000港币，而在东莞只要300元人民币。他加了一句说，大概相差10倍。这是风源。这阵风会不会把他在香港的厂刮走，我不敢预料。香港怎么变，我们暂时可不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阵港风在大陆上吹起的变化。1988年大陆上的沿海发展政策就是这阵港风吹来的。大出大进，两头在外，三来一补，外向型企业，外贸权下放等等，已变成了经济改革中的流行名词，我已应接不暇。

从香港吹来的这阵风，也唤起了我的记忆。我记起了前几年我曾请那位亲戚到吴江去参观，目的是想在江苏和香港之间搭座桥。我建议他在我们家乡开个分厂。他看我的面子，把办厂计划都搞了出来，可是快要签约前，他的几个合伙的朋友却退缩了，原因是吴江离香港太远，能不能按期交货没有把握。失信事小，赔钱事大。我的面子毕竟大不过经济规律，这个项目吹了。不料事过几年，原来可能在吴江见到的这个工厂却在东莞

出现了。这件事说明了人情世界已经过时，面临的是个我还不太熟悉的、也不习惯的由经济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一个韦伯所阐述的理性世界。珠江模式的出现看来谁也挡不住的。

令人深思的是上述三种模式的差别。如果我们可以说苏南模式多少带着浓厚“内发型”的意味，珠江模式应当可以说是“外向型”了。当然苏南模式中也包括接受从上海这个大城市扩散出来的技术和信息，但是在程度上和珠江模式相比却大有区别。珠江模式中主要成份是不仅两头在外，而且是主体在外，因为掌握着经营管理权的并不脱离它原来的中心，而且利润主要部分是吸收到外在的中心里去的。苏南模式是当地农民利用城市的协力自己创造出来的企业，而珠江模式则以外地力量在当地农村自愿接受的条件下输入的企业。在所有制上苏南模式可说是社区所有制，而珠江模式是什么所有制，我还说不清。它们在发展我国农村经济上都起着重大的作用；今后怎样发展下去，两者是否还会发生新的区别，还是留待以后去说罢。

(四)

自从我接触到了“珠江模式”后，我对发展模式的概念又有了深化，在多少带着一种静态意味的“因地制宜、多种模式”加上了“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动态观点。

我在比较苏南和温州这两个模式时，已注意到前者背靠上海这个大城市和苏、锡、常、通4个中等城市，而温州却背山面海，是个被备战形势封闭的港口，没有大中城市可以依靠。这个区别可能是这两种发展模式分道扬镳的起点。当我接触到珠江

模式时，心里不得不想到它和苏南模式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出于各自的靠山不同，一是上海，一是香港？上海在抗战前原本是个仅次于日本东京的东亚大港。那时香港只是国际航运线上的一个船只靠岸、加水、加煤的码头，在这里上下的旅客和装卸的货物是有限的。当时中国的南大门还是在广州，所以广州的市面比香港更为繁荣。自从新中国成立，大门紧闭，对外实际上只留了香港这一借道的出口，香港却因此发迹了。

香港在近10多年来简直是象张开了满帆，在顺风中破浪前进。香港现在的大亨们有多少不是这些年头靠地价上涨而发起来的？香港已成了东亚可以和东京并立的现代化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了。近年来又发展了近5万家工厂。看来香港的工业基本上和温州模式一样是由商业带出来的，相同的是都属小型制造业，不同的是温州的市场在国内而香港却面向世界，小巫见大巫。珠江模式是抓住了香港和内地工资差和地价差，不失时机地兴起的，是香港经济的扩散。

苏南靠近上海。而上海，30年来已是个封闭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业主要是按计划经济经营的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原材料供应和产品分配都由国家包办，自身不会发生向外扩散的作用。上海的经济扩散力因此不能和香港相比。长江三角洲在这方面比珠江三角洲也就相形见绌。如果不是“文革”把上海这种封闭状态打开了一点缺口，在“停产闹革命”中大批老技工回乡，苏南当时的“社队工业”，看起来也成不了“异军”而突然兴起的。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政策下苏南企业逐步靠上这个比较开放的大城市。后来居上的昆山县乡镇企业在近两年里的发展，就